

中国经济再平衡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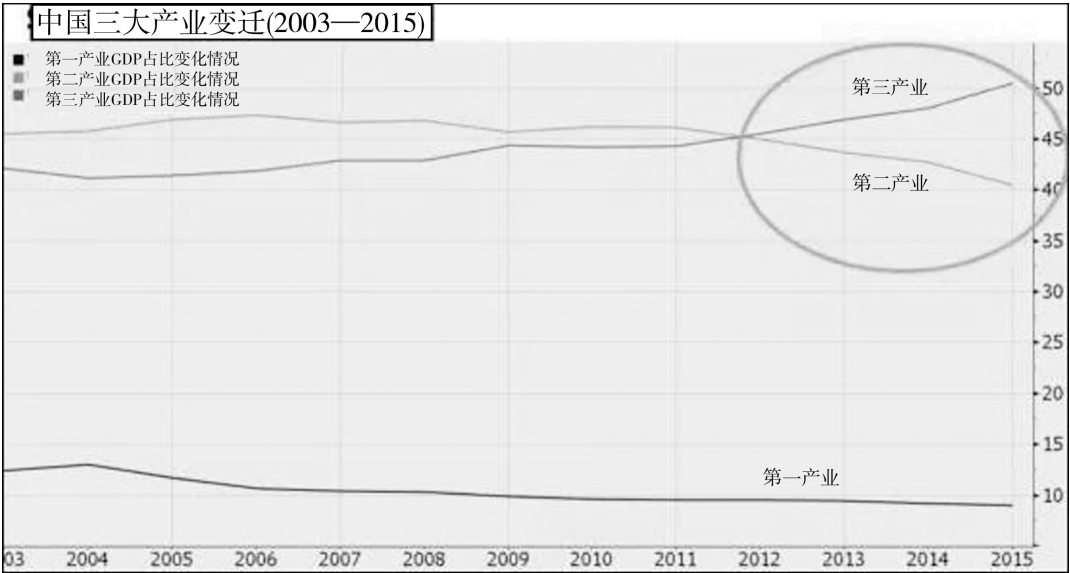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中国农业银行 陈 佳^{*}

1. 引言

1.1 从 2013 年中国迈入新常态开始,决策层描绘了转变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加速培育新经济从而实现更加均衡、绿色发展这一宏伟蓝图。此后的三年间,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开始加速,而作为经济转型和产业转移的标志之一,中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占比在短时间内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中国大陆的服务业占比已经雄踞第一位,并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之间的增速剪刀差还在持续上升(图),二三产业转型已经是目前中国经济活动中最为鲜明的特色。我们这里借用国外同行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分析框架,作为理解中国新旧经济再平衡的一种参照;尽管这个框架比较粗略,但中国新旧经济的转化与博弈,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一系列特殊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

1.2 另一方面,中国在第三产业迅速超越第二产业期间,发生了规模宏大的区域性劳动力迁移和部门间投资转移,时间虽短却足以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方方面面。从二、三产业相对比重的变迁及其劳动力转移速度的角度衡量,中国事实上已经取得了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成果,尽管未来这一进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但如果仅仅把中国经济转型成果、新旧经济转化模式理解为二、三产业之间比例的变化,及其引致的一系列后果,那么就有可能忽视充分实现经济转型和绿色均衡增长的加速器——第一产业。实际上,我们认为对于立志实现人均 GDP 增长目标的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将第一产业中大量低效劳动力存量在下一阶段成功地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里,我们结合目前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迁移的角度,希望扩展对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讨论。

^{*} 陈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及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作者电子邮箱: cjtommy@me.com。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及中国农业银行的观点。



数据来源:彭博社

2. 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含义

很多关注中国经济的国外研究者都倾向于把当下中国经济中的增长模式转变和产业转移统称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究其原因,是因为当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确实经历着再平衡过程,并且体现出日益明显的分化态势——从经济动能上区分,一是次贷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经济复苏强势货币派,二是以日欧为主的弱势经济收缩与弱势货币派,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增长模型并表现为两种增长速度;从区域发展上划分,一是以 G20 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二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这两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出现加速分离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各经济体所依赖的国际分工体系也在发生新旧转换,另一方面近两年的金融市场动荡更加加剧了这种分离的趋势,个别新兴经济体不仅经济严重下滑且政局出现动荡。两种速度、两种经济,这已经成为理解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失衡的一个重要脉络。当然,随着全球市场变化日新月异,经济体增长预期不断调整,这种划分可能并不总是准确;然而当我们把这种全球视角投射到中国内部经济、审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的一系列新现象新难题的时候,反而可以帮助困惑者跳出盲人摸象式的局限、抚平小马过河式的不安。从以往经验来看,但凡中国经济部门间发展不相匹配的时候,往往与我们的二元经济相关;而中国经济当前所体现的特色,显然已经超越了过去城乡二元架构的范畴,我们参照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框架,将其归结为两种经济(新旧模式)、两个(区域增长)速度。

3. 新旧两经济

3.1 旧经济的特质

新常态以前,中国经济成长原本高度依赖的是大规模投资。在民间财富并不充足的时期,显然大规模投资只能依赖于国家政府;随着民间财富不断积累,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公共投资为内核,外延至广大民间投资的这一整套投资体系;而这种以公共投资为核心逐渐外延到民间投资集群的特征,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恰是大陆商业模式的中国特色。事实证明:当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在投资标的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之时,这种模式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因为在社会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投资的竞争性与标的一致性是互斥的;目标一致性在整体上削弱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政府主导的模式在特定条件下确保了社会资本在经济层面的投资效率。从经济增长引擎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把新常态之前的旧经济高度概括如下:大规模公共投资驱动在先,民间投资陆续跟进,产能迅速扩张超过内需,最终通过外贸实现高速增长。

3.2 经济增长引擎的升级换代

3.2.1 公共投资增速放缓的两大重要原因

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国经济原本高度依赖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增速明显放缓。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单纯依赖政府债务融资来拉动经济这一旧经济增长模式本身是缺乏可持续性的,中国目前遇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杠杆问题就是明证;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必须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在经历三十年超高速增长之后,旧经济引擎的后劲明显不足,虽然在某些条件下旧经济部门的增速依然很快,但总体下滑的趋势非常迅猛;无论是需求端还是供给侧,在宏观经济增长接近 7%、服务业增长和消费需求增长位于历史高点的阶段,旧经济的产能甚至无法与国内需求相匹配,不得不转向国际市场,而清除落后产能则成为国家经济战略之一。

3.2.2 经济引擎换代与宏观资产荒

政府投资下降加上去产能战略,对旧经济部门的产出形成了双重压力:其直接效应是导致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对地方经济的驱动力逐渐下降;间接效应是降低了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力。当公共投资标的变得稀缺的时候,私人部门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替代项目的资源,于是就出现了私人投资争抢公共投资标的的乱象。最初这种现象只限于局部金融市场,例如二级资本市场上风险偏好的改变导致资产配置问题、造成短期可供投资的产品匮乏——两年前城投债的最低收益率的下界也在 7% 以上,大型银行的零售理财产品收益平均低值都在 5-6% 以上,表面上看这好像是钱(流动性)荒,实际上是资产(投资产品)荒。随着新旧经济转换

导致社会投资预期改变,局部资产荒已经超出了二级资本市场范畴,上升到宏观经济投资层面——当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政府不再同时承担价值发现和资产配置两大职能的时候,金融市场并没有做好及时充分准备来接棒,民间投资也尚未成熟到可以局部替代公共投资的阶段,就形成一种结构性的资产荒,表现为投资增速下降拉低整体宏观经济增长,它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增长引擎的改变。

3.2 新经济的特质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引擎升级换代的问题,国家在战略层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方式做了调整,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战略地位开始超越以外向型制造业为代表、已经高速发展三十年的第二产业。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转变的推行都会面临阻力,在我们看来关于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利用创新驱动经济的争论其实并不陌生。若跳出中国改革争论的空间局限,放眼全球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时期恰逢美国经济成功的走出了2007年以来的大衰退,并且通过以新一代互联网、载人航天等大众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重新引领世界经济潮流。彼时彼刻,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战略就很自然地必须与这一世界潮流结合起来。所以从因果角度来看,中国的新经济战略的提出绝非偶然;并且事实上,新经济战略的起步阶段也是比较顺利的。很短时间内,中国大陆就完成了互联网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最初的门户网站到繁荣的社交网络、从推广电子商务到成熟的互联网购物、从简单的网上商城到复杂的一站式专业服务网络;不仅如此,互联网服务业还借助政策扶持和成本物流社交等竞争优势渗透到经济、金融等许多领域,成为新经济的代表。尽管中国的新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现在就来系统地评判中国的新经济,显然为时尚早。首先,中国经济引擎更新换代还远未完成,影响经济转型的一些核心障碍还正在清理;其次,推行新经济在产业、金融、环境、民生等领域的一系列后续工作还任重道远;最后,新经济自身还处在发展初期,并不完善,许多配套监管政策也缺乏先例,需要创新。不过,新经济尚未全面实现这一事实,并不影响我们对新经济的未来特质做一下展望:投资、消费和外贸关系更加匹配,并作为内生变量,全部决定于中国经济长期均衡增长趋势,经济成长的数量与质量并重,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比例适当,人均指标大幅增加。

3.3 新旧经济与宏观指标

仅从实体经济角度来看,中国新旧经济转换的过程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即便转换过程比较顺利,宏观经济走势也不大可能回到过去三十年一路向上超高速增长的情况,更有可能的是一种波动式上升的S型走势。从近两年的表现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指标呈现出愈加分离的趋势——例如GDP增长率与制造业增长率分离、二三产业增速分离、新经济指数与旧经济指数分离等。这些指标的分离,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总量型指标本身缺陷造成的,不足以反映经济部门的最新变化;更重要的方面应该是经济总量中新旧经济之间发展鸿沟的加大,这

是指标趋势分离的核心原因。另外,中国总体是个资源稀缺的国家,而今全球化遭遇挫折确实影响了国家资源配置的问题。所以,给定资源约束,新旧经济之间的博弈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指标分离的趋势可能还会加大。

4. 南北两速度

4.1 南北发展速度拉大是结构性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增速下降与各经济体增长不平衡加剧,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再平衡阶段的标志。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呈现加速分离的趋势:美国以新经济为基础、以货币政策正常化为标志,逐渐走出了 2007 年以来大衰退的阴霾,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国家;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除印度外)的增速整体都在不断下滑,考虑到金砖四国除印度外都几乎都走完了初步的工业化进程,都面临全球分工格局重构的大趋势,都需要进一步优化内部经济结构,增速调整并不意外,更何况新兴经济体近两年还遭受了全球市场动荡的冲击、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但我们认为,近两年新兴经济体遭受的一系列冲击中,全球市场动荡导致新兴经济体出口严重衰退、汇率不稳、资本外流,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全球经济失衡倒逼新兴经济体开始结构转型才是最核心的原因。

4.2 全球经济失衡与市场大幅震荡倒逼转型

对于全球经济增速不平衡近期加剧,学术界传统上认为是由于不同经济体的禀赋差距造成的。当国际分工格局发展到新经济阶段,市场化程度、监管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资源环境一样,都是孕育创新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要素,在这方面,显然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一直都存在。之所以近两年增速指标的差距看起来在加速扩大,很可能是因为上一次美国和欧元区以及日本受到 2007 年以来大衰退的冲击,使得南北在发展指标上的差距当时得到了缓和。一旦冲击效应减弱,例如美国经济重回增长轨道,这种差距就再一次显示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体上新兴经济体并没有真正抓住契机,减少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这充分说明新兴经济体单纯靠出口资源和外向型经济驱动发展的模式可持续性并不高;并且从近期市场严重动荡的表现来看,旧经济发展模式的抗风险能力也不佳,所以新兴经济体转型是非常必要的。

4.3 中国经济转型令南北增速差暂时拉大

与世界经济一样,新旧经济转型要求宏观经济增长引擎发生转换,幅员辽阔、不太平衡的中国区域经济也大致呈现出南北两种速度。凡是转型速度较快、新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整体经济增速就领先;反之则落后。以最南端的云南为代表,旅游经济、贸易区经济、提升产业链、加速创新以及劳动力转移结合工资增长,其最新的年增长率数据高达 8.7%,南部相当多的地

区都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潜力;相比之下,尤其是以东北各省为代表的北部区域,其资源消耗型经济、产能落后、处于产业链末端、劳动力流动性差,工资增长几乎停滞,即便是作为东三省经济最活跃省份的辽宁,其年增长率仅为3%。中国区域经济增速差距日益明显,并且显然已经超越了区域经济协同的范畴,必须放在宏观经济转型层面加以深刻研究。

5. 中国经济再平衡,第一产业是关键

在新常态以前,国内学术文献有关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讨论焦点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尤其是利用新型城镇化来促进中国消费升级、产业转型,从而实现部门经济转型和最后的宏观经济再平衡。新常态之后,研究的焦点逐渐转为传统制造业如何与新经济模式相结合,通过全面升级换代旧经济和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实现新经济,从而加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和再平衡。客观地说,中国政策界传统上充分重视第一产业的作用,但学术界主要还是从国家长治久安、粮食战略安全以及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新兴农业角度出发的。虽然学术界的研究焦点从需求端发展到供给侧,是经济再平衡方面研究的一个进步,例如关于新经济指数方面的研究;但是新常态条件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贡献却并没有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进而农业人口转移对于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巨大驱动作用也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参照国际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最明显的,其实并不在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而是在第一产业。所以考虑新兴经济体第一产业高企的劳动力存量,能否迅速向二、三产业迁移,就不仅仅是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实现再平衡战略的有效途径,更是直接影响我们关于十三五规划中人均指标能否顺利达标的键。这里我们引用了一些国外同行的优秀研究成果,希望对扩展传统上对农业人口转移的理解纬度,从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强化产业转型的驱动力、加快实现人均指标翻番的供给侧角度,做一个初步的讨论。

5.1 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在第一产业

回顾有关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国际比较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重要结论:第一、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差别,第一产业远大于二、三产业。其形成机理在于第一产业劳动力的自我维持物质成本——在新兴经济体中,这个成本相对较低,劳动力市场的逆向选择结果,使得最终选择留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往往是生产率较低的群体;相反,在发达经济体中,这个维持成本较高,从而保证了进入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是生产效率较高的群体。第二、第一产业劳动力自选择机制的国别差异,导致其劳动生产率的国别差距远大于全部产业生产率的国别差距均值,而非农部门劳动力自选择效果与农业部门劳动力自选择效果正好相反,因此其国别差距也相对较小。第三、产业间劳动力收入差距会加剧以上两种效应。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农业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可能并不单纯是农产品价格体系的问题,反而更可能是劳动力

理性自选择以及农业部门规模不经济的结果。

5.2 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在第一产业

如果上述结论也适用于中国,那么为了顺利实现新经济、转换经济驱动引擎,将农业部门剩余的大量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甚至是第二产业,这在经济层面就是有效的。因为如果这些劳动力留在第一产业,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只能通过对其追加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在农村地区实现更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相比之下,其投资效率远远低于将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后再追加同类投资。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地方政府淘汰落后产能的积极性不高,很可能是因为当地存在的大量劳动力已经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落后产能部门,如果直接去产能而不加以引导,这些劳动力可能会回到农业部门,从而极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中央政府:如果要提高一些地方政府去除落后产能的经济激励,去除落后产能可以多策并举,例如:有针对性地扶持促进当地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新经济部门,则是一个较好的方法。

5.3 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是第一产业

中国经济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短期最可见效的途径就是将大量低效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但是,如果要完全实现经济再平衡,这个单向转移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投资,逐渐将高素质劳动力引入到第一产业之中,就好像目前部分地区蓬勃开展的新农业所预示的那样。毕竟第一产业作为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短板,提高其生产率就是提高全员生产率。更重要的是,如果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临界值,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自选择机制已发生改变——只有当第一产业的自我维持物质成本较高的条件下,才会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进入这个产业。而当第一产业劳动力维持成本较高的时候,这意味着中国三大产业的劳动力平均消费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总消费水平已经足以支撑供给侧改革的成果,从而跨越了中产收入陷阱,真正实现了经济的再平衡。

参考文献:

- Dehio, Jochen, Roland Dohrn, Rainer Graskamp, Klaus Lobbe, Hans Dietrich von Loeffelholz, Waike Moos and Michael Rothgang, 2015, *New Economy: The German Perspectiv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Lagakos, D. & Waugh, M. E., 2013, Selection, Agriculture, and Cross-Country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2), 948 – 980.
- 陈佳, 2016, 中国经济下行是周期性的吗? 财联社, 2016 年 1 月 22 日。